

“醉拂菥”:希腊酒神在中国

——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

葛承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特聘教授)

汉文史料将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菥”，长期以来由于拂菥造型艺术的文物传入数量稀少、年代久远而彰显不明，学术界对此涉足很少甚至断然否认。2015~2017年，笔者多次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察新出土文物，承蒙张全民和田有前的详细介绍，将隋墓新出土的陶骆驼从库房中展示出来，驼囊上有失传已久的“醉拂菥”艺术图像，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形象栩栩如生。虽然出土拂菥的图像姗姗来迟，但它提供了希腊罗马一拜占庭艺术传入中国的确凿的新证据。

一 西安隋墓出土“醉拂菥”驼囊的特征

近年西安考古发掘出土的三件“醉拂菥”驼囊，均出于隋墓之中^[1]，时间为开皇、大业年间，墓葬中还有其他众多的陪葬陶俑，融汇了北齐与北周两种地区艺术风格，但是其中出土的隋代陶骆驼悬挂驼囊上出现有“醉拂菥”艺术造型图案，着实令人惊讶欣喜又心驰神醉。据现场考古发掘者介绍，长安茅坡陶骆驼出土时已经破损，但其身上背负的

驼囊造型依然完好；长安郭杜陶骆驼虽然残破且有损坏，但拼接后仍能清晰地看出基本模样（图一~四）。

陶制驼囊分左右两面，长圆弧形，按工匠原设计应是分两边搭在驼背上，犹如真实的驮队驮囊，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一是酒神。在驼囊艺术造型中，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位于画面正中央，他深目高鼻，脸庞布满浓须，赤裸全身，唯腰间扎动物皮作为遮盖布，露出肥硕肚子；地面有酒器来通以及顶部常春藤成串茎叶，这种组合是典型的酒神形象（图五、六）。作为希腊的财富之神，狄俄尼索斯总是在丰收之时给人们带来欢乐^[2]。印度北方的贵霜王国曾经有大量的财富之神形象，其特征就是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有时酒神参加庆祝的形象是手拿一只酒杯坐着或斜躺在卧椅上。

二是随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随从也是他的信徒。其一是萨梯尔（Satyrs），身穿织布包裹全身，是罗马男性象征地位的托加袍（Toga）。另一个是女子迈那得斯（Maenads），她身穿束紧腰带的无袖短袍斯托拉（Stola），

图一 茅坡 M21 出土
陶骆驼(左侧)



图二 茅坡 M21 出土
陶骆驼(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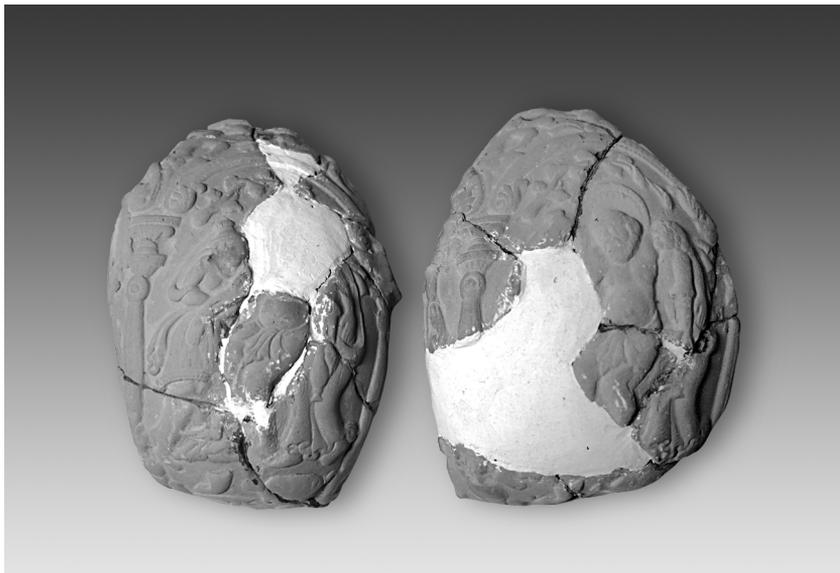


是罗马妇女不加披风的装束。这两个随从中，男子有时是长有动物耳朵、犄角、尾巴和山羊（或马）蹄子的带胡须生物，半人半兽类似潘神（Pan）形象。女子则是一个不停活动在仪式上陷入狂热兴奋的人^[9]。现出土驼囊上生动刻画了一男一女两个随从搀扶醉醺醺的狄俄尼索斯形象，酒神已经步态跌撞，头垂手落，符合希腊—罗马酒神传统的艺术形象（图七）。

三是安法拉（Amphora）罐和来通角杯。

这两件器物都是希腊生活用品，其造型与地中海沿岸发现的陶器、酒器一致（图八）。安法拉罐用来装酒或芳香油，显然不是东方使用的容器。来通角杯远不局限于饮用器，而是在酒宴上具有重要的仪式和象征作用，尤其是在希腊社交场合中，酒器的使用已经融入到风俗和仪礼程式中，描绘神话场景时酒器等陶制容器图像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所以在酒神图像里必然出现^[10]。

四是拱形门廊柱子（图九）。根据维特鲁



图三 隋张琳墓出土驼囊

威《建筑十书》介绍，古罗马传承古希腊建筑艺术，有三种柱式风格。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多利亚式，源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爱奥尼克式，源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科林斯式^[5]。

爱奥尼克柱（Ionic）通常竖在一个基座上，将柱身和建筑的柱列脚座或平台分开。柱头由一对标志性的涡形装饰置于模塑柱帽上从内绽放出。其作为一种窈窕均衡的具有女性姿态的柱子，广泛出现在古希腊的大量建筑中，如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神庙和伊瑞克提翁神庙。这种爱奥尼克式柱的风格启发了

许多其他领域的设计，有种说法“大宛”国名就是印度人受希腊影响演化而来，源于希腊城邦“爱奥尼亚”（Ionian）。

科林斯式柱（Corinthian Order）的比例比爱奥尼克式柱更为纤细，柱头是忍冬草形象（或说用毛茛叶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它的装饰性更强，雅典的宙斯神庙采用的是科林斯式柱。罗马帝国初期科林斯式柱成为最流行的风格。

陶骆驼驼囊场景上的拱廊柱子未用希腊三角门楣，而是在罗马式拱券门加上华丽雕



图四 隋张琳墓出土驼囊线描图

1. 驼囊 A 面 2. 驼囊 B 面 3. 驼囊上侧武士图像



图五 茅坡 M21 出土驼囊



图八 茅坡 M21 出土驼囊上的来通角杯与酒罐



图六 茅坡 M21 出土驼囊细部



图九 隋张琳墓出土驼囊上的科林斯柱子



图七 茅坡 M21 出土陶骆驼局部



图一〇 隋张琳墓出土驼囊上的酒神局部

刻，呈科林斯式倒置的铃状，用四叶花形装饰。而且它是复合型柱式，将多个鼓形石块垒叠在一起，改变了以前单块巨石的简单状态。柱顶楣梁上拱形券构将连续檐壁延伸出去，构成了穹形拱顶华丽的装饰。酒神站立不稳的身体后面衬托出建筑视觉的关联，带莨苕叶饰和卷草纹的科林斯柱石成为大自然造物最完美的表现，将建筑比例和匀称内在的秩序与人体相匹配，是古典主义理想的展现。

五是常春藤装饰。在最崇拜酒神的希腊阿卡奈地区（Acharnai）喜欢用常春藤装饰庆典场所，营造茂密叶茎下的柔和样式。但是其他地区更多的是用葡萄表示丰收的果实。醉翁之意不在饮酒而在葡萄节赏乐的神情，愉悦地融入歌舞狂欢之中，将酒醉后的气氛推到了极致，仿佛画面中也弥漫着酒香。

驼囊呈现的场景由点到面看，整幅画面神韵独出，技法娴熟，酒神狄俄尼索斯一幅舒缓放松、醉生梦死的模样，不是微醺而是酩酊大醉，已经无法直立身子。但他不是形单影只，而是身子在两旁人围绕簇拥下，扶肩搭背，似乎刚从狂欢中退出来，侧旁的男子随还手提鸭嘴胡瓶。特殊的是，酒神头部背后有圆形头光。头顶背后有光环，这是酒神与太阳神的混合特征，中亚这类形象极为常见，某些特征一直传到了中国（图一〇）。太阳神苏利耶（Surya）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常位于太阳光环的中央，其借助了伊朗神许多特征，而袄神密特拉本身则从阿波罗神那里继承了某些特点。在多民族混居地区经常出现不同宗教的互相影响。

纵观驼囊左右布局，刻痕有起有伏，节奏有张有弛，人物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彰显了浮雕的生命感。最后要关注的是，驼囊侧面顶部有头颅高昂的武士（图一一），头戴盔帽，身穿外套形的铠甲，紧腰束带，衣襟外展长达膝盖。武士单手支撑在前伸大腿上，另一手似持长矛或长剑，一副远望沉思“新样”。这种人物是否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男神阿瑞斯（Ares），或是英雄赫拉克勒斯



图一一 隋张琳墓出土驼囊上侧武士图像

（Heracles），以及少年武士成丁礼仪式，需要进一步解读。

二 酒神狄俄尼索斯艺术造型的流传

狄俄尼索斯神是酒神和狂欢之神，他是宙斯与底比斯凡人塞墨勒（Semele）生下的儿子，即是希腊神话中唯一一个母亲为凡人的神。他是在漫游过程中发明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神，他经常乘着由狮子、老虎或豹拉的双轮车，在大批半人半羊和一群酒神狂女（Maenads）的伴随下周游世界，推广酒神崇拜。

关于他的起源一直不清楚，或许是最早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崇拜，还有人对他是否为希腊本土的神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的起源与印度有关，有人则认为他与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神有关^{〔9〕}。

狄俄尼索斯最初并不是奥林匹斯的主要

神祇，因为重生的神话，在希腊后期历史中酒神开始被人们重视起来。酒神在罗马又称巴克斯（Bacchus），是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酿酒的保护神，传说狄俄尼索斯懂得所有自然的秘密以及酒的历史，乘坐着由野兽驾驶的四轮马车到处游荡。他走到哪里，乐声、歌声、狂饮就跟到哪里。酒神祭祀是最神秘的祭祀，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放纵欲望。但是他生性乐观、积极向上，象征促进万物生长与自然界的重生⁷¹。

古希腊人在葡萄收获季节祭祷狄俄尼索斯神的仪式后来成为悲喜剧的起源⁷²，仪式最初只有妇女参加，禁止男子观看。最高潮时往往是无节制地纵欲欢呼，他们将代表酒神的山羊、蛇等之类动物撕碎作为圣餐，罗马时期继续延续这一酒神颂歌活动，在庞贝城遗址中发现有反映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马赛克壁画。罗马帝国后期，皇帝和基督教会都下令禁止旧宗教仪式，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首当其冲，成为被查禁的重点对象，因为饮酒发展到酗酒已是帝国衰败的原因之一，但是葡萄收获时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狂欢活动已经浸淫民间深入人心，各地祭祀酒神的仪式秘密流行仍然屡禁不止。

现存最早最全面的狄俄尼索斯酒神资料出自希腊著名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约前480年至约前406年）的《酒神伴侣》（又译为《女酒神的信徒》或《酒神颂》）。古代流传下来描绘与塑造狄俄尼索斯的艺术作品很多，从开始留着长胡须的威严形象到后来青年柔和脸庞的线条，各式各样，垂肩卷发、头部饰带、头戴花环、手持神杖或手拿酒具。如果说艺术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那么图像在交流中远远超过了文字，起源于地中海地区的酒神超越疆界进入欧亚大陆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喻示着歌乐狂饮、发泄情绪的酒神精神，成为各地民众挣脱束缚、获得新生的快意喜好。

狄俄尼索斯神的形象在西方古典艺术中很受欢迎，在古希腊、罗马的壁画、雕塑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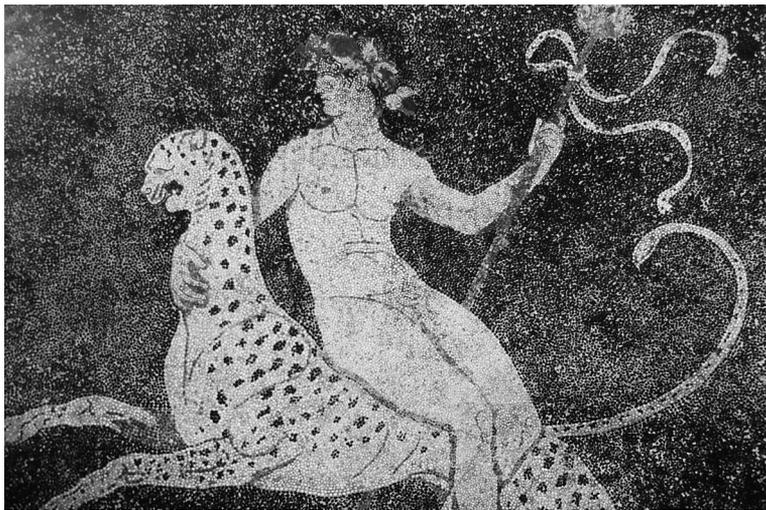
各类器物中比比皆是，主要有三种类型，最早是留着长胡须的男子形象，后来又变成漂亮文弱的青年形象和童婴的形象，他的主要标志是酒器、常春藤花圈、葡萄藤、酒神杖（Thyrso 两头装饰有常春藤叶子，象征男性生殖器），陪伴他的不仅有狮子、老虎、豹子等猛兽，还有象征多产的金牛、公羊等。狮子或豹子经常成为他的坐骑或是为他拉车巡游，此类题材的艺术品的数量和种类都非常丰富⁷³。

拜占庭帝国境内也流行狄俄尼索斯酒神，出现在艺术品中的狄俄尼索斯神常常都是东倒西歪醉醺醺的形象，与他形影不离的是酒罐或酒杯，这是“醉拂林”的最基本特征（图一二）。有的图案上的狄俄尼索斯手持神杖与狮子或豹子在一起（图一三），被人们混同为外邦进贡狮子的拂林图，并没有一点醉醺醺的样子，这可能是人们不清楚两者的区别，虽然都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形象，但醉与不醉，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彩绘陶骆驼，品相完整，色泽鲜艳，也以驼囊上酒神狄俄尼索斯形象享誉海外（图一四、一五），但其英文说明为“这种大夏人的陶塑骆驼模型可能是中国制作的古墓随葬陶俑的一个罕见



图一二 酒神狄俄尼索斯马赛克镶嵌画



图一三 狄俄尼索斯骑豹镶嵌画(希腊北部佩拉宅邸1号房间出土,前330~330年)

例子。驼囊上的中心人物身份是不确定的,他可能代表的是印度的俱毗罗(Kubera),夜叉(Yakshas)之王,描绘他在饮酒的场景,旁边的女人在侍奉。然而,在对俱毗罗的描述中,满脸大胡子和没有头盔是不寻常的。另一种对场景的解释是,这三个人物的灵感来自于《基督落架图》,这是早期基督教肖像学中一个重要主题,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10]。这个说明值得商榷,尽管其“希腊化”辐射延伸到中夏和印度,但实际上这个驼囊酒神图像很有可能来自粟特人或景教教会的传播,不必旁枝繁叶绕到南亚,据记载,568年出使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突厥外交使节摩尼亚河(Maniakh)就是擅长语言的粟特人^[11]。至于基督从受刑的十字架解脱下来更是望图生义。

隋墓出土驼囊的“醉拂菻”图像,不仅证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也源自中国隋代,而且证明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艺术造型流传是有脉络的,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拜占庭其创造的神话题材一直是不朽传奇。令人惊喜的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陶骆驼与隋张缙墓、茅坡墓出土的陶骆驼在造型上相同,驼囊直接搭在驼背上,并有毡帐支撑排架。驼背顶上侧翼都有武士形象,均位于方形毡毯铺开四隅,帐篷顶部雕刻出圆窟窗

(图一六~一九)。只不过西安出土的红陶胎无彩绘,略显粗糙。至于欧洲收藏者展示的驼囊酒神图像(图二〇),虽无完整陶骆驼,但图像清晰,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基本相似^[12]。

三 狄俄尼索斯酒神文化在中国的遗痕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进攻东方,到达中亚和北印度,势力影响非常深远。他不仅在征服途中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文化的城市,而且把希腊文化带入了中亚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在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都发现了希腊城市文化遗址和一批遗物。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很喜爱和崇拜狄俄尼索斯酒神,在到达据说是狄俄尼索斯起源的圣城印度奈萨后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活动。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建立的塞琉古王国仍为一个希腊化国家,中国称之为“条支”。它占据着伊朗东部高原地区,公元前3世纪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2世纪它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夏征服,结束了希腊化国家的统治,但是希腊化的文化仍被大夏继承,此后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虽经几次倒手控制,可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并留下了许多古典遗产的艺术品。

希腊文化中重要的酒神崇拜在这一地区继续流行,在犍陀罗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狄俄尼索斯神塑像,酒神节的音乐和歌舞都融入本地区的文化之中。据生活在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记载,当亚历山大抵达巴克特里亚和粟特时,当地已生活着能够用希腊语和他交谈的居民,而且那里有崇拜狄俄尼索斯的习俗^[13]。

图一四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陶骆驼(左侧)



图一五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陶骆驼(右侧)





图一六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陶骆驼酒神图像



图一七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陶骆驼驼囊细部



图一八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陶骆驼顶部

阿富汗蒂拉丘地即“黄金之丘”墓地在1978年被考古学家发掘后，1世纪初期大量的黄金制品面世，其中希腊—大夏背景的华丽金腰带非常引人注目，腰带徽章圆形上面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手举酒杯骑着花斑豹^[14]。酒神狄俄尼索斯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拜，因为他象征着欢乐和重生，似乎只要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希腊化”（Hellenism）地方都有他的影子。

美国学者曾探讨了传统酒神狄俄尼索斯和部分东方希腊化世界戏剧的关系，在佛教文化和犍陀罗影响下，贵霜王国1~3世纪的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都有崇拜狄俄尼索斯的现象，尤其是酒神祭拜仪式被引入了犍陀罗佛教世界^[15]。希腊神话故事还在贵霜一些城市流传。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了1世纪希腊罗马风格的红陶神话人物面像与来通。

巴黎吉美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6世纪末期的中国石棺床提供了来自中亚移民宗教多样性的例证，黎北岚认为石板的主题来自两股不同影响的潮流，其一来自希腊世界，其二来自印度。因为第6块石板上表现了一个醉酒的人卧倒在石床上，拿着兽头来通酒杯，还有狂舞的场面，她认为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主题^[16]。但实际上这是粟特贵族模仿西方“倚榻饮酒”的惯有模式，没有葡萄串装饰相呼应，不是希腊酒神的艺术表现。

客观地说，由于缺乏史料，中国与“拂菻”拜占庭的交流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传来的艺术品经常被人们误判，酒神狄俄尼索斯从三国时期进入中国后就被人们搞得混淆不清，将胡人骑狮与“醉拂菻”混为一谈。沈从文在《狮子艺术图录》中命名的“醉拂菻弄狮子”，将西晋以后出现的“胡人骑狮”水注或灯台以及“胡人与狮子”共处的形象，统称为“醉拂菻”^[17]，实际恐有误。由于当时出土的实物少，“醉拂菻”难以确定。

中国出土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形象最明确的就是甘肃靖远县的鎏金银盘，出土地点正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1988年银盘



图一九 茅坡 M21 出土驼囊顶部

出土后，由于坐在狮（豹）背上持杖青年男神像模糊不清，研究者众说纷纭，初师宾认为它是4~5世纪拜占庭前期制造的，盘心神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Apollo）或酒神巴卡斯^[18]。日本石度美江认为盘心神像应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她根据大夏铭文释读认为银盘是2~3世纪罗马时期北非或西亚制造的，传到巴克特里亚大夏（Bactrian），4~5世纪又从大夏进入中国甘肃^[19]。林梅村进一步确认其神像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20]。

笔者认为持神杖倚靠在花豹或狮子身上的年轻男神，虽是狄俄尼索斯酒神形象，但还不是“醉拂菻”，即不是葡萄节欢庆饮酒后醉醺醺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醉拂菻弄狮子”的形象，恐看不出醉的状态。银盘上的酒神形象虽然还是古希腊的艺术风格，但随着生产地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神态。

隋唐时期在长安盛行的拂菻风劲吹一阵，画家们记载的“拂菻图”到了宋代已是照猫画虎，宋代邓椿《画继》卷八载，成都双流张珪家藏有一幅宋人曹道川临摹三国时吴国曹弗兴《醉拂菻图》，可惜早已佚失。

《铁围山丛谈》卷六、《愧录》卷一二“文武服带三制”记载，宋太宗时“中兴之十三祀，有客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铤于

吾，敌骑再入，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异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状，拂菻人皆笑起来，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宋代“醉拂菻”金腰带有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晚期从海路传来的舶来品。

元代画家任仁发临摹宋代李公麟《五王醉归图》画作，可能模仿了“醉拂菻图”，画中描绘了开元初唐宫春宴归来的五王中，临淄王李隆基伏马酒醉的形象，两边有宫奴侍奉搀扶状，“大醉不醒危欲坠，双拥官奴却鞍座”^[21]，其创作思维与醉拂菻形式相同。

隋唐时期中国与拂菻（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可惜因资料凤毛麟角又似是而非，出土文物中能被确定为受希腊罗马影响的拜占庭物品也不多，除了数件玻璃器、金银器和石刻画有拜占庭的“拂菻风”外，其他能确定的不多。几座隋墓“醉拂菻”驼囊神话艺术图像的连续出土，带



图二〇 流散在欧洲的类似酒神藏品

给我们一系列思考：为什么汉人墓葬的随葬品中有希腊酒神的驼囊？为什么酒神画面上有穹顶拱形门柱？为什么酒神头顶上的灵光环是蒲扇式？为什么扶他的男随从手持鸭嘴壶、女信徒身披飘带？中国工匠制作的酒神模本究竟来自于中亚粟特还是拜占庭帝国？酒神流传究竟属于庙堂艺术还是世俗艺术？如此等等，图像的幽微细节，传播的路径演变，足以让我们继续研究很长时间。

隋代虽然是30多年的短暂王朝，但它扭转了北朝以来突厥的威胁，降服四夷，拓疆扩土，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的一个大国。隋文帝、炀帝被突厥人尊称为“圣人可汗”，不仅继承了北朝胡汉体制，而且鲜卑关陇贵族在胡风汉韵交汇下，继续吸纳外来的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承载着文化的流传，而物质文化传播的同时也有宗教观念、神话故事等的紧密相随，贸易交往和精神思想共同构成一个时期文化交流的整体图景。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虞弘墓、安备墓和李诞墓等北朝隋代墓葬出土的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银壶上的希腊神话“帕里斯审判与海伦回归”，更是希腊罗马—拜占庭艺术在中国传播的证据^[22]。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的“醉拂林”陶骆驼来看，以及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完整陶骆驼观察，隋代陶骆驼造型艺术中流行着外来酒神的“型”，艺术工匠有同类的母范模式或模本，不仅再次证明常用神话艺术表达的“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而且证明隋唐长安是中西交流“异域情调”的丝路传播地，为我们解疑释惑提供了极好的物证。

千年来沉寂的“醉拂林”只留下令人想象的名称，不见“原貌”真实图像，现在经过考古发现，跨越千年幸庆再现，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有益于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映照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神话经典的

文明标志。

附记：本文部分图片由张全民、田有前和邱忠鸣提供，谨致谢意。

- [1] 田有前在《茅坡考古散记》中记录了2011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的隋墓中出土的陶骆驼，驼囊上有罗马酒神图像，见《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的隋张琳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陶骆驼见《西安长安隋张琳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2] [德]奥托泽曼著、周惠译《希腊罗马神话》“狄俄尼索斯”，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 弗朗西斯卡·里佐《希腊神话：一种对文明的表述》，《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文物出版社，2016年。
- [4] 来通杯(Rhyton)作为向酒神致敬的圣物，是祭拜酒神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饮酒器，多为牛、马、鹿甚至犬科动物的头部造型，液体从动物的口中流出。曾广泛流行于自美索不达米亚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在西亚出现的来通杯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东西方相融具有来通酒器特征的罕见文物，见孙机《玛瑙兽首杯》，《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 [5] 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古罗马”，第87~99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
- [6] Rosemarie Taylor Perry(罗斯玛丽·泰勒·佩里)，The God Who Comes: Dionysian Mysteries Revisited(神谁来：酒神之谜新探)，p. 89, Algora Press, 2003.
- [7] Kerényi Karl, *Dionysos: Archetypal Image of Indestructible Life* (狄俄尼索斯：坚不可摧生活的原型图像)，Princeton: Bollingen, 1976.
- [8]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绪论”，三联书店，1986年。
- [9] Jameson Michael, *The Asexuality of Dionysus: Masks of Dionysus* (酒神无性：酒神的面具)，Ed. Thomas H. Carpenter and Christopher A. Faraone, Ithaca: Cornell UP, 1993.
- [10] 张全民译自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网站，并提供与笔者商讨，特此说明。
- [11] 东罗马历史学家Menandros的记录，见[法]沙畹编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209~211页，中华书局，2004年。

- [12] 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亚洲部主管苏苒女士(Suzanne G. Valenstein)介绍,购回的陶骆驼于2000年入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类似的陶骆驼在欧洲还收藏有2件,目前所知全世界共有5件。限于欧洲收藏界的行规,不便公布。
- [13] [希腊]艾兰娜·阿芙拉密多《丝绸之路上的希腊与中国》,《丝路艺术》,漓江出版社,2017年。
- [14] 2016年笔者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观察“阿富汗黄金秘宝展”中陈列的金腰带酒神艺术造型,可见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Tillya Tepe Tomb IV*, p. 97, Tokyo National Museum, 2016。
- [15] Pia Brancaccio, Xinru Liu, *Dionysus and Drama in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狄俄尼索斯与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戏剧),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9)4, pp. 219-244.
- [16] par Pénélope RIBOUD(黎北岚), *Lit de Pierre, Sommeil Barbare*, p. 42, Guimet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2004.
- [17] 沈从文《狮子艺术图录》,图8,《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见《沈从文全集》第2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 [18] 初世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 [19] 石渡美江《甘肃省靖远鎏金银盘的图像と年代》,《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13号,1992年。这件银盘上还有粟特文,有待进一步解读。
- [20] 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7期。
- [21] 程敏政《任月山五王醉归图》,见《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22]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王霞)

“Drunken Fulin” : the Greek Wine God in China — on the Modeling Art of the Exotic Myth Motif on the Camel Bag Figure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the Sui Dynasty in Xi’an

Ge Chengyong

This paper makes in-depth analysis to three camel figurines of the Sui Dynasty archaeologically unearthed in Xi’an in recent years. On the camel bags carried by these three camels, the so-called “Drunken Fulin” motif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c anecdotes is depicted, vividly showing the figure of Dionysus supported by two attendants, matching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modeling of the god of wine in the Greco-Roman mythology. The entire design consisted of the arcade, rhyton, amphorae, ivy vine patterns and the figures of the warriors beside them with highly holding heads, which is a new definite evide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orship of god of wine originated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nto China across the boundaries. Referring to other physical evidences of the Greco-Roman and Byzantine arts discovered within China in the recent century, the unique rout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typical symbols of the Hellenized mythology in China is again proven, and the in-depth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via the Silk Road are also benefited.